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数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夹在汉晋与隋唐之间将近三个世纪的南北朝，既是政权林立、战乱不断的乱世，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意义。

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群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国家或割据政权，中国北方也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新时期。对于这些内迁和沿边各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现象，传统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视之为野蛮民族对华夏政权的破坏。但必须指出，这一提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五胡”入主中原后，无一例外地自视为华夏正统王朝，并曾为此目标作出巨大努力。如果能打破“夷夏之辨”等旧有的思想壁垒，便可发现所谓“五胡乱华”的本质，其实是中原王朝控制力衰退与周边民族势力崛起所导致的竞争与碰撞，随之而来的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公元304年，南匈奴左贤王刘宣等人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起兵反晋，掀起了后来“五胡”竞相争逐、纷纷建立政权的动荡历史。刘宣等南匈奴守旧势力希望趁着西晋诸王混战的乱局，“复呼韩邪之业”，即恢复匈奴国家。不过，曾长期生活在洛阳，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刘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效法汉高、魏武，建立一个新的华夏式帝国。

为了消弭匈奴的民族特性，争取汉地士庶的支持，刘渊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将“德”而非“族”，作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来源与依托。刘渊又援引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的史事，提出“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汉王朝的继承者，以便取代西晋。是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立坛，自称“汉王”，并建社稷、宗庙，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4年后，刘渊正式即皇帝之位，大赦境内，改元为“永凤”，国号仍为“汉”。这些史事均说明刘渊对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取，不是以匈奴人的名义进行的，而是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进行的，他绝不满足于担任匈奴一族的“单于”，而是希望成为胡汉各族共同尊奉的“皇帝”。

刘渊建立的“汉”，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此后，又有羯人石勒以“赵”为国号，鲜卑慕容氏以“燕”为国号，氐人苻氏、鲜卑乞伏氏、羌人姚氏皆以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交融

□ 吴天宇

“秦”为国号，铁弗匈奴赫连氏以“夏”为国号。与刘汉政权相似，这些胡族政权名号的确立也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了审慎考虑，其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将自己塑造为继承汉、晋的华夏正统国家。前燕国主慕容皝称帝后，曾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皝并不自视为夷狄，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得到中原士庶拥戴、继承中原王朝正统的皇帝，因此燕国应与东晋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将鲜卑人慕容皝与匈奴人刘渊相较，二人所处时势虽异，但其基本政治主张与继承中原正统的努力，则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的共性。

“汉”“赵”“燕”“秦”等华夏式政治名号的选择，体现了“五胡”对“中国”的认同。不仅如此，由于“五胡”大多内迁较早，在汉地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很多胡人对汉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些胡族精英对汉文化的熟悉程度，甚至与汉人士大夫相比也相差无几。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的《廿二史札

记》中有“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指出十六国时期很多胡族君主都雅好经、史、文学，这是很敏锐的观察。

前述汉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青年时代曾系统地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精通经、史以及诸子之学。刘渊曾评价汉初功臣说：我观览史书时，时常会鄙薄萧何、陆贾没有武略，周勃、灌婴缺乏文采。言下之意，自己才是文武双全的豪杰。这话虽有夸耀之嫌，但也体现了刘渊对汉文化的精熟。刘渊的长子刘和、第四子刘聪、族子刘曜都曾学习经、史，或擅长书法，或工于文章，可知南匈奴刘氏一族自西晋时就已普遍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熟悉汉人经史典籍了。

鲜卑慕容部的统治阶层也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史载前燕的奠基者慕容皝曾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儒生刘讚，即燕王之位后，他大力推行文教、设立学校，每月都亲自考核学生，将优秀人才拔擢为近侍。前燕的第一任皇帝慕容皝（皝次子）也博观图书，雅好文籍，他的爱好之一便是处理完政务后与侍臣辨析义理、讨论学术，史称其即位以来一直讲论不倦，一生著述

计四十余篇。后来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皝幼子）、后燕建立者慕容垂（皝第五子）之子慕容宝，也都是从幼年起便接受汉文化教育。可见鲜卑慕容氏的三代统治者也都深受汉文化熏染，有着较高的汉文化水平。

建立前秦的是原居于略阳的氐人苻氏。苻氏一族起初本以武勇著称，但在进入中原后，他们很快便开始接受、学习汉文化。苻坚8岁时想请老师到家中教学，他的祖父苻洪惊叹道：我们氏族本是戎狄，累世只知饮酒，没想到今日竟然有求学的人，于是欣然许之。而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苻坚也变得“性至孝”，博学多才艺，与其父、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苻坚之弟苻融的汉文化水平较其兄长更加出色，他聪辩明慧，下笔成章，所作《浮图赋》壮丽清贍，为时人所称誉。苻坚之侄苻朗则著有《苻子》数十篇，体现了他对老庄之学的深刻理解。后来前秦能够在政治上较前后赵、前燕又有所发展，进而统一北方，与氐人苻氏迅速且深入地接受、学习汉文化，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氐人苻氏相似，后秦的统治者羌人姚氏一族在进入中原后也迅速接受、学习汉文化。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很重视发展文教，在他统治期间，关陇一代的耆儒硕德皆率领门徒到长安讲学，各地学生前来学习的多达一万余人。姚兴长子姚泓据说博学而善谈论，尤其喜好诗咏，他周围还聚集了王尚、段章、富允文、胡义周、夏侯稚等学者，君臣间时常讲授儒术、品论文章。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五胡”在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不仅择取汉式国号，试图继承中原正统，其贵族精英也迅速接受汉文化，一些胡族君主崇尚儒学、提倡文教的行为，尤为引人注目。也难怪赵翼会感慨：这些胡族君主“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五胡”上层贵族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汉化倾向，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胡族统治者个人对汉文化的热爱，而应将之与胡族国家政权的“华夏化”进程结合起来理解。永嘉之乱后各胡族相继进入中原，以本民族部众为中心，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士庶，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各政治集团间展开军事与政治的竞争，其中一些逐步发展、壮大，而另一些则被吞并、整合。胡鸿曾指出：中小型的政治体可以部落、军阀等多种形式存在，但最高级的政治体——帝国，其制度与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当时已经有了成熟的模板，那就是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对于“五胡”而言，创立全新的高级政治体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苛刻的条件，在狼烟四起、烽火连绵战争年代，这显然不现实，因此学习、吸收、继承华夏政治体制，就成为其统治中原、建立国家政权势所必然也是最为理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君主对汉文化的接受，与胡族国家政体的华夏化，其实正是一体两面；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汉化，又将在一定程度

上淡化族群之间的冲突与界限。“五胡”政权华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吸纳大量汉人尤其是汉族士人进入到其政权中。周伟洲先生曾对史籍所见的汉赵国共263名官员进行统计，其中匈奴刘渊一族44人，刘氏宗族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共计114人，而汉人则多达131人，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18人。当然，国家机要之职大多仍掌握在匈奴人手中，但汉赵政权中的汉人数量已经非常之多，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与汉赵同类，后赵、前燕、前秦诸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大量举用汉族士人：后赵石勒任用汉人而非胡人为中正官，大开汉人入仕之途；前燕慕容皝控制辽西后，将逃亡至此的河东裴氏、鲁国孔氏、安定皇甫氏、右北平阳氏、广平游氏、平原朱氏、渤海封氏及高氏等高门士族，都吸收进入政权，并予以足够的礼待；前秦政权也多次令各州郡推荐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之士，吸引汉人入仕，而苻坚与王猛之君相关系，更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与汉族士人相结合的典型。这些汉族士人积极协助胡族统治者建立、完善各种典章制度，不仅稳定了十六国各政权的政治秩序，也大大促进了胡汉之间界限的淡化。

“五胡”政权华夏化的又一个重要体现，是接受、学习汉晋王朝的制度文明成果。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普遍以汉、晋王朝的政治制度为本，建立起三公（诸公）制度、三省制度、地方郡县制度，以及用于等级身份管理的军号、封爵、散官等制度。西北地区出土的文书还提示我们，一些胡族政权还效仿汉制建立起了文书及户籍制度。此外，汉晋时期面向士人的察举与考试制度，也被十六国大多数政权所继承。凡此，皆可见汉晋制度遗产对十六国各政权的深刻影响。

“五胡”政权对华夏正统的认同与追求，对汉文化与汉晋制度的接受与学习，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流、交往与交融的一面。还需指出，各胡族在进入中原时，也带来了饱含“胡风”的政治文化因子，在继承汉文化、汉制时往往也杂糅了一些部族传统。如西魏一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的部落旧制密切相关，但正是府兵制的确立，帮助西魏一北周战胜了东魏一北齐，并对后来隋唐兵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胡汉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是双向的。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胡”与汉族融合为一，为汉族注入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使其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开创空前之世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强盛的隋唐王朝，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上接1版）

加快提升现代企业治理能力，强化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保障。一流的企业必须有一流的治理。近年来，国有企业通过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但机制不完善、“大企业病”等问题尚未彻底根除。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传统、彰显中国智慧的现代治理新模式，完善组织治理体系，增强战略管理能力，实施精益化管理，加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合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聚焦重点领域风险加大防控力度，尽早发现、有效处置风险隐患。通过健全完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力争实现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升企业稳健合规经营、持续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处理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提升带动联动能力，形成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格局。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既是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的愿景目标，也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深化合作、共赢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要深化股权合作，积

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强各类所有制企业优势互补。深化创新合作，鼓励大型企业扩大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融通创新，真正形成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的“辐射圈”，共同提升产业价值。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充分发挥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打造现代产业集群。通过各类所有制企业间良性互动，力争形成大中小企业竞相共赢的良好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创造价值、更多贡献力量。

加快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拓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空间。国际化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化经营力度，业务覆盖面更广、融入全球经济程度更高，但全球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还需要切实提升。要积极响应全球发展倡议，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稳妥开拓国际市场，打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

质量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产业规范等制定，推动中国产业标准、产品服务标准国际化，增强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能力。通过主动融入全球市场，力争尽早建成面向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的生态系统，实现资本、资源、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全球化配置，切实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

加快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塑造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声誉。品牌是高附加值的重要载体、世界一流企业的软实力标配。整体而言，中央企业品牌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要结合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等，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品牌实践，强化品牌意识，加强战略引导，加快创建一批管理科学、贡献突出、价值领先的卓著品牌。进一步明晰品牌定位，科学构建品牌架构体系，积极运用品牌管理先进理念方法，持续提高品牌管理运营能力。借鉴优秀跨国公司成熟经验，完善海外品牌建设体制机制，以优质产品服务“走出去”带动品牌“走出去”。通过深入实施品牌强企战略，力争打造一批走向世界、享

誉全球的知名品牌，切实增强中国品牌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

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之路

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不是简单套用跨国企业的模板，也不是国外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翻版，必须扎根我国国情、立足企业实际，坚持出资人主导和企业主体相结合，把创建一流根植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勇做国家大战略大布局的践行者、发展方式转型的带动者、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人民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之路。

坚持正确方向，着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市场优势有机结合，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根本保证。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把党的全

面领导贯彻到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过程，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站稳人民立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在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服务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服务“国之大者”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撑托底作用，努力提供更多优质低价的产品服务，从微观层面引导均衡、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各类资本更好发挥繁荣市场经济、增进人民福祉的积极作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把握重大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一切优秀企业无不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打拼出来的。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遵循客观规律，积极吸收借鉴

历史上企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壮大实体经济，坚持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更大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现代新国企，切实增强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国资国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